

我的清华和化七一班

○ 林柏楠（1977级化工）

上 路

清华的入学通知上要求新生在1978年3月3日到3月5日之内报到。我买了3月2日的车票，这样就可以第一天报到。

吉林市到北京的快车当时要走大约十八九个小时。中午上车时吉林市还是冰天雪地，车窗上结着冰花。第二天早上车过山海关后天亮了，窗外明显比关外热很多。远处的柳树也开始显露出淡淡的绿色。

车过唐山站，窗外是1976年7月大地震垮塌的厂房和厂房里停的被砸坏的日本式的火车头。能够想象出来，一年半以前的那场地震肯定非常剧烈。

记得快到北京时，在列车广播的新闻里有一条是关于清华新生入学的。新闻里说，清华录取了八百多名新生。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又决定增加二百多名走读生。这样计算，清华七七级应该有一千多名学生。

我上学时刚刚过了20岁生日。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列车上的我充满了对大学生活的期待。

初到清华

学校把新生和行李从火车站接来后，把箱子都按系码在大礼堂前面的草坪上。我的箱子来得很早，所以我是最早上12号楼安排行李和床位的新生之一。

到清华后见到的第一个老师是张超泉



林柏楠清华学籍卡照片

老师，他是化71班的辅导员。我自己的事办完之后，张老师给了我一辆三轮车，说先到的同学要接后到的同学，这是清华的规矩。我按规矩蹬上了这个三轮车帮同学拉行李。不过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拉过哪位同学的行李了。

需要说的是，我从来没骑过三轮车。本来以为骑三轮车跟骑自行车没什么两样，结果两个不很一样。三轮车没法借力，转弯时必须硬掰车把。我一开始不适应，一上车就撞了树墙和上面的铁丝网，把手刮出两个小口。不过刮完了就学会了。

我到清华后见到的第二个老师是谢新佑老师。谢老师是南方人，口音很重。他见到我后问我：“你就是宁波蓝？”我听懂了，“宁波蓝”就是“林柏楠”。所以我答道“是”。

我不可能纠正他的发音。外地口音么，可以理解。在一般人看来，这本来就不是个问题。然而，这个“宁波蓝”还是



开学当天校报第一版

我被分配到1班（化71），高分子化工专业。刚入学，辅导员张超泉老师说我已经指定为班级召集人。这让我感到很意外。我虽然当时还没有见过大多数同学，不了解情况，但我还是能肯定班级里的同学一定有很多人比我水平高、能力强。这个张老师不应该让我这个小地方来的没见过世面的人当召集人。不过我这个人不愿意推脱工作，虽然心里不情愿，但没有表达出来。

班主任指定班级召集人应该是拿学生档案里的信息作为判断依据的。后来我琢磨张老师选我当召集人一定是被我高考报名表的鉴定意见给误导了。那个鉴定意见是下洼子大队出的，盖的大队革委会的章，但鉴定是我自己写的。记得当时是在大队部的会议室填表。大队党支部书记嫌麻烦，让我自己写自己的鉴定。我肯定是实事求是地对自己进行了客观鉴定，只是说得稍微好听了一点儿。最后我还写了一条，说这个知青是我支部重点培养的积极分子。那个副书记盖章前还是仔细阅读了我的鉴定意见，在读到积极分子的位置时好像犹豫了一下。不过她盖了章就表示这是党给我的鉴定哈。我猜全校一千多名新生里，自己给自己写鉴定的应该不止我一个人。

报到不久，我在张老师那里抄了一份1班新生登记表。化71共有38名同学，其中有29名男生，9名女生。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是吴光夏，1948年出生，内蒙来的，是师范学校的数学老师。年龄最小的是吉林市来的在校生张蕴，1962年生。全班同学里出生年代的统计最大值在1956、1957和1958这三年。绝大多数同学入学前是插队知识青年，绝大多数同学是共青团员。

化工系的男生都住12号楼的5层，新生

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今天。

我的名字中的“柏”字是个多音字。我的名字在家里念做林“百”楠。我所有的家人、亲戚朋友、中小学同学都叫我“百”楠。自从有了“宁波蓝”，我就成了“伯”楠了。

“伯”这个念法我很快就适应了，我不觉得有纠正的必要。

从吉林来看我的人不适应这个叫法。他们当中大概有的人会猜想我这样更改名字的念法也许有点别的意思。不过这事儿从来没人问我。我也就从来没有机会讲“宁波蓝”的故事给他们听。

谢老师的“宁波蓝”还搞糊涂了一个人，就是陶海心。陶海心一开始跟我分在一个房间，就是12号楼515。他来得晚些，进屋后就打听谁是宁波来的。

一班简况

我被录取到化工系，这跟我报的志愿是不一样的。不过对于我来说，上清华是最重要的，学啥专业并不重要。

住顶楼应该是清华的规矩。女生住5号楼。宿舍楼的位置安排非常合理，离食堂和运动场都很近。教室的安排非常不合理。化工系的学生经常被安排头两节课在化学馆上，后两节课在工物馆上。两个地点的距离太远，课间的15分钟刚够走路的。没有自行车的同学总是赶不上好座位。

情况汇报

入学后不久，好像在开学典礼后两三天内的一个中午，我被通知到12号楼三层的系学生团委去一趟，我接到通知就下了三楼。当时去的是哪个房间我不记得了，但记得是一间朝北的房间。

一进房间我就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庄重肃穆的气氛。这个房间没有床铺，只有几张书桌，非常整洁。房间里有五六个人，大概一半男生一半女生。所有的人都穿着草绿色军装，其中男生好像都戴着军帽，并且至少一个女生也戴着军帽。此外，记得大部分人扎着武装带。印象里好像有一个人有领章帽徽（现役军人）。房间里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抽烟，都在工作，个别人偶尔走动。总之，这里就像一个作战指挥部，里面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团委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也没有介绍。接待我的人是一个男生，我猜是一个五字班的学生。他知道我是化71的班级召集人后，叫我坐下来谈。记得他说，叫我下来，是要了解班级里的同学的情况，主要包括政治面貌、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年龄，等等。我当时刚刚抄完全班的情况表没多长时间，记忆力又非常好。我凭记忆给归纳了班里有多少人是党员、多少人是团员、多少男生多少女生、

多少知识青年、多少回乡青年、年龄分布，等等。除跟我谈话的人以外，好像还有两个人也在听。他们听了没有太多表情。当我离开时，感觉他们比我进房间时客气了两分。

知青大战小流氓

入学后不久，学校安排7字班搞建校劳动。记得当时有同学对建校劳动不满，其原因当然不是嫌劳动辛苦，而是不想再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劳动上。

1班的建校劳动头几天主要在南北主路的北端靠近学生宿舍区的地方平整土地，后几天是建游泳池。

好像是干活的头一天，1班被要求分派几个人去照澜院干活。当时派了黄家伟、田野和陈钢三个人。黄家伟是北京知青，擅长打篮球，他后来成了清华篮球队的队长。田野也是北京知青，陈钢是广西知青。这三个人一看就知道是干活的好手。

那天中午收工吃完饭回宿舍后发现田野手上包了一块纱布。一问才知道，他们三个人在照澜院跟社会闲散青年发生了殴斗。记得田野说他们在照澜院干活，因为小事儿跟几个小“街溜子”发生口角。后来，他们以为事情就过去了。不料，在收工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帮人手拿棍棒来打他们。他们三个人拿铁锹迎战。他们人少，所以选择且战且退。那帮人好像没有死命追。他们跑开后，那帮人就向他们扔砖头。田野躲闪不及，左手挨了一砖头。

下午上工出门之前，黄家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把小斧头。他一边往腰里别斧头，一边放狠话：“下午这帮小流氓再来捣乱，我就跟他们拼了！”

我觉得劳动是公事，犯不着为公事跟

□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小流氓拼。但是为了避免事态扩大或恶化而不去照澜院了好像也不合适。咱是知青，还怕几个街溜子不成？

照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上报的规定，当时应该向老师汇报。不过学校的老师都是书生，即使报告了，老师也不会有治小流氓的法子。最妥帖的办法是增加几个人，最好是下过乡的知青。这样，下午我和郭虹，还有一个同学增援照澜院。

下午这帮小流氓没再露面。估计他们是人数不够多，算计不出来对付六条汉子的优势。加人的方案看来奏效了。

北大板报风波

记得开学没多久，好像在4月份，学校在大礼堂给7字班开会。会议应该有多项内容，其中一项是通报北大的板报事件。

这个事件的大概经过是这样：北大新入学的77级学生很活跃，尤其是文科学生文章写得好，用板报的形式歌颂英明领袖，抒发心里的愉悦情感。北大历史系的新生出的一期板报上登了一个学生写的诗。记得当时在台上讲话的老师念了这首诗的前四句，并介绍了大概内容。我曾经记下了这几句，但现在只记得第一句是：“我来自黄土高原的陕西。”这首诗接下来的内容大意是当初我头上没有长角，身上没有长刺，所以我一直没有上学念书的机会。现在在华主席领导下，我有了机会。我要感谢、我要努力，等等。

这首诗里所暗含的工农兵学员是因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才上了大学的意思冒犯了在校的工农兵学员。他们在北大校园里贴大字报，批判这首诗。

在那个当口上，我恰好要去北大。我父亲同事的孩子在北大地理系念书，是

1976级工农兵学员。他的父亲让我给他捎了点东西。

我拿了给他捎的东西去找他，是中午去的。他的宿舍里有五六个学生。我在介绍了自己之后，能感到整个房间里充满了敌意。我按照吉林人的习惯，给每个人发烟，给他们点火，气氛才稍微缓和了一点。这是给所有人一个台阶。接下来，我发现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大哥”也十分冷淡。在他那儿没啥可聊的，简单客套了几句就告辞了。

摸底考试

大约在北大板报风波之后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数学摸底考试。

记得开学后的数学课是从解析几何开始的。这相当于吉林1975年“高中”最后学期的课程。这个课程对我正合适。因为从解析几何开始对我压力相对小，有利于进入念书状态。到学校后，能感到不少同学的数学功底很强。班里吴光夏、姚力、田维平上学前都是数学老师。我当时对自己的估计不是很高，知道班里有强手，但也不很担心。我对解析几何还是有把握的。

学校通知摸底考试，我也没有紧张。考成啥样是啥样。虽然有好的心态，考试卷发下来后，我还是立马出汗了。卷子有相当比例的题我根本没有见过，就是我能答的题，第一眼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好答。

答完卷，我的心都凉了。这哪是我林柏楠的卷子！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无奈无助过。从考场出来，听到不少同学在相互探讨一些题的解法，而我根本插不上嘴。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拿到录取通知后一直在心底的喜悦和自满这下全都烟消云散了。

后来各班由辅导员分别宣布了摸底考

试的结果。我猜是学校故意安排辅导员宣读每个人的分数。我们班是在一教的一间朝东的教室宣布的分数。记得我只得到49分，非常惨，离及格还差一大截，在班里排倒数第10。

这是我活了20岁第一次在考试中得这么可怜的分，第一次不及格，第一次落在同学的后面。我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次考试对我来讲太重要了，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意识到，我必须付出艰巨的努力才能念好这个大学。

这次考试应该对相当比例的新生产生了巨大震动。考试的结果是7字班的新生还没有来得及表现出他们心里的得意和自大就被当头棒喝。所有的人都老实了，乖乖地进图书馆、上教室念书做题去了。

摸底考试最主要的目的显然是让学生自己明白一点，那就是上清华跟中举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艰苦的学习还在后面。学校的这一招真是绝了，一箭多雕。

赤脚大仙

1班有个奇人叫陈钢。

陈钢是柳州来的，壮族人。这个陈钢真是够壮的，浑身上下都是块儿肉。跟这个肌肉男一比，我这干农活出来的身子骨只能算是皮包骨。一看就知道，这壮汉体力过剩，精力过剩，能量过剩。

这能量过剩是有证据的。这个陈钢天冷天热都不穿多少衣服。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穿这么少的衣服绝对不是为了展示发达的肌肉。那个年代不时兴肌肉男。展示肌肉也吸引不了女生的眼球。相反，那时候肌肉发达并不给人正面的联想，因为社会上给不好好学习的年轻人的标签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所以，能够看

出来他不是展示肌肉。如果有谁还不相信这样的判断，可以到他的床铺上看看。这个壮汉冬天夏天都是在床板上铺一床凉席睡觉，这冬天睡光板床肯定不是为了展示肌肉。

这样的耐冷水平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东北来的人其实不抗冻，东北人的习惯是天冷就加衣服。反正你是不可能单衣过冬的。冬装迟早得穿，那最好到时候就穿，别“得瑟”。对我来讲，12号楼冬天房间里不是很暖和。像陈钢这样睡光板一定是皮肤的传热系数特别小，发射系数也特别小。那么什么“皮”有这样优良的品质？肯定是广西大山里梯田上犁田的水牛的“牛皮”哈。而且这“牛皮”绝对不是吹出来的。再说了，这在下面支撑肌肉的骨头也得是虎骨。

这个壮汉不但衣服穿不住，鞋也穿不住。开运动会他不穿跑鞋，不穿田径鞋，说穿了不得劲儿。当时东西两个操场铺的都是炉渣一样的东西。陈钢头几次参加运动会都是光脚跑的。因此，他在1班有一个雅号，叫“赤脚大仙”。我记得是田野给起的。

我想如果陈钢可以无顾忌地自由选择的话，他一定会选择光着脚去教室上课，去图书馆看书。

陈钢后来进了校田径队，拿了多次全能冠军，进了校队后，他还是逐渐文明开化了，开运动会穿跑鞋了。后来听说他一次跟北边体院的学生赛羽毛球，对手是羽毛球少年组全国冠军，陈钢三比零把对方给灭了，牛得很。

第一个中秋节

1978年的中秋节是9月17日。那天系

□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里在东操场组织了秋季运动会。虽然规模不大，水平比校运会差很多，但同学参赛的积极性都很高，气氛非常好。参加运动的同学和下面观战的同学都很开心。

那天我们化71得了总分第一。运动会后，1班的同学个个都挺高兴。

那天还有一个高兴事儿，就是那天傍晚，学校请中央乐团在大礼堂门前举办交响音乐会。晚饭后，大家都到大礼堂前来听音乐。记得当时是列队去听的这个广场音乐会，我们班的位置比较好，比较靠近礼堂前的台阶，偏向水利馆一侧。

那天的音乐会是李德伦指挥的。李德伦跟学生说，粉碎“那些人”给文艺带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说他今天来是他推广普及交响乐的努力的一部分。那天的音乐会是一边由李德伦做解说一边演奏的。演奏的乐曲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中央乐团的演奏水平那当然是没什么可挑剔的。李德伦讲解一段，乐队演奏一段。



1978年全班春游香山。自左至右，前排：林柏楠、林积荣、田野、陈钢；第二排：姚力、齐健、潘延明、余可思、陶海心、苏利杰；第三排：姜倩、邓建元、李秀玲、班主任张超泉老师、张蕴、司纓、彭薇、陆学红；第四排：刘扬、郑元锁、郭光明、张伟明、杨树林、王吉成

李德伦在讲解其中一段时说：“这段乐曲表现的是一人踉踉跄跄地行走。”可惜，他把踉踉跄跄念成了“狼狼苍苍”。结果引起下面学生不大不小的哄笑。

不管怎样，学生们肯定很享受这场音乐会，而且一定不介意这个著名指挥家念几个白字。我就是如此。不过指挥家本人回去一定很不开心。

那天的天气很好。在音乐会开始前在宿舍楼前集合时，一轮金黄色的满月就已经从东操场升出地面。1班那天派人买了月饼和雪花梨全班分享。那天晚上是美曲加美食还有美丽的月亮，再加上比赛后的快活心情，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很开心。那是在清华五年生活里记忆最深的几件事儿之一。

从那以后，我每年过中秋都会想到月饼和雪花梨。

加入党组织

化工系7字班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入学前就在工厂农村入了党。1班入学时有两个党员，一个是马晓龙，一个是唐森。还有一个预备党员郑元锁。

入学后第二学期化7学生党支部把我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联系人是马晓龙。后来我入党时的介绍人是马晓龙和唐森。经过两位介绍人的努力和组织的考察，1979年初，吸收我入党的事儿上了日程。

党支部对发展我入党是非常慎重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支部大会召开之前，马晓龙多次找我谈话，组织委员欧阳颀也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欧阳是北京人，他思想敏锐，见多识广，上学前在延庆插队。我记得他跟我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了解我为什么要入党。记得他说，文革给国家造成巨大破坏，使很多人蒙冤受屈，

这些大大影响了我党的形象。我为什么要在我们党声望如此低的时期要求入党？

印象里我回答的是：文革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现在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我们党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核心力量。我立志建设四化，所以就要投身到组织中来。欧阳说，对历史问题，我们党还没有结论，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他还给我留了作业，说我要在党支部大会上讲一下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还说了，你不要紧张，只需要你去思考。

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非常难。答案好像不能从文革中编写的教材里面找。那从哪里找呢？如果不从权威的官方的资料里找答案，我自己能造出来答案吗？我自己没有这样的本事，还得找。

我当时手上有两本我自认为可用的书，都是我妈妈给的。她是学历史的，后来阴差阳错地被派到农业学校教政治。这两个材料一个是《联共（布）党史》，一个是60年代中苏论战时，我党的左派大理论家们写的“九评”，这第二份材料我上中学时就读过至少两遍，插队时又读过一遍。这一次，我又通读了一遍，并侧重读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我当时认为，“九评”中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适用的，所以我对党支部大会上的答辩是有信心的。

党支部大会是1979年6月21日晚上举行的，地点在工物馆。除了化7党支部的党员外，系党委学生组的老师，包括刘述礼老师，还有校党委的方惠坚老师都来了。化7来了不少入党积极分子。6字班学



林柏楠和入党介绍人马晓龙（右）

生党支部也派人来旁听。听马晓龙说，这是清华第一次在1977级新生里发展党员。本来全校一共有两个要发展的新党员，由于工物系的那位同学在外调/政审方面出了点枝节，只剩下我一个。

党支部大会按照常规进行。我记得支部大会会有一个“答辩”环节，内容就是对现实中重大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欧阳给我安排的家庭作业。我记得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可以不同，但社会主义应该有如下特征：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第二是有共产党的领导，第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第四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会议最后是自由发言，六字班一个同学在发言中夸奖7字班党支部办事严谨，程序正规，还夸奖我这个新党员不但有跟工农结合的经历，还很有理论水平。

林柏楠，吉林省吉林市人。入学前是吉林市郊区九站公社插队知识青年。1978年3月入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化工专业，1982年11月毕业。毕业后一直从事知识产权法律工作，现为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律师，专利代理人。